

问计中国经济学家

——中国顶尖经济学家 对话录

目 录

赵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大学的理念

188

终身教职的设计：选拔优秀人才还是保障学术自由？ 188

内生的学术标准：扭曲与归正 193

本土化与国际化：中国人的大学理念争执 195

赵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大学的治理

200

也谈“中国建设一流大学” 200

大学配套改革及中国大学集体崛起问题 204

教授治校还是校长治校 208

赵晓、龙希成 VS. 张维迎

大学改革的方向

213

大学改革：先改教授还是先改行政人员？ 213

大学改革：公共选择与公共理性问题 217

中国大学改革之前景 222

赵 晓：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是“中国经济展望论坛”最后一场，随后就将举行闭幕式。由于今天是圣诞节前的平安夜，所以我想，今天这场论坛是非常有意义的。

首先介绍一下现场的嘉宾，两位都是我国重量级的经济学家，一位是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另一位是著名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教授。

樊 纲：我是不过圣诞节的，所以平安夜不平安也与我没有关系。但是在 2003 年末了，想到这一年的经济表现不俗，我想再祝大家新的一年快乐。

林毅夫：现在确实是年末了，再过七天就是新的一年。回顾这一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一年。首先是神州五号上天展示中国的经济增长特别快速。过去大家老在怀疑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真的还是假的，现在，世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变成了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其次，中国已换了新的一届政府，新政府对突发其来的“非典”处理得非常好。原以为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很快就过去了。所以今年确实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年底的时候，跟各位网友一起探讨我们过去一年是怎么过来的，以及在来年我们如何继续取得经济更快速的增长。

赵 晓：谢谢两位教授，刚才两位教授都谈到，今年的经济增长确实是表现不俗，但是也有人马上提出来，会不会过热呢？两位教授有什么观点？

今年投资增长过快是导致 中国经济局部过热原因

樊 纲：我个人比较早地谈论过中国经济过热苗头、过热趋势问题。要说现在中国的经济就已经全面过热了，也不见得，但是，过热的趋势还是存在的，而且这几个月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趋势导致的问题也越来越暴露。

我想，今年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投资增长过快。应该说，今年的投资实际增长率是改革开放 20 几年来最高的一年，比 1992、1993 年都高，那时候，如果不扣物价指数按名义值来算是百分之五十几，扣除

必须在今年经济增长的态势下，仔细的分析，提出一个比较好的对策。

赵 晓：谢谢两位教授，刚才两位教授都同意，中国经济尽管表现很好，但出现了过热的迹象，两位教授并指出了一些现象。请问，对于这些现象的判断在宏观政策上是什么含义？或者说在政策上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应有什么样的调整？

樊 纲：谈论政策，首先要搞清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这样才能使政策起到效果。

在这儿我想多少再讨论两句关于今年总体经济情况和结构的一些问题。消费相对来讲依然是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因素，而且，由于我们失业的压力比较大，农民的收入提不高，因此，从总体来讲，消费一直比较平稳。今年需求的扩大主要是投资需求的扩大，而且中国历次经济波动都是因为投资的波动而产生波动，但这个投资波动最终会涉及消费者消费的领域，当然会比较晚，可能要到后期，到投资热到很高的程度，增长到很高的程度，一系列的投资支出导致各行各业开始复苏起来以后，这时候消费价格就开始要上涨了。那时，消费的总量也会有所上涨。

我们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在工资受到抑制的情况下，消费实际上不可能有快的增长。但是，从宏观的角度讲，只要有一部分稳定的增长、总需求就会增长。因此，我认为，首先要采取宏观的经济政策，有的时候部门的政策不是说不起作用，但是，首先应该是宏观政策。比如，钢材投资过热、过猛，钢材的投资今年增长了150%，去年是百分之六十几，而钢材部门今年还专门开了一个会，说我们投资不多，因为我们投资了这么多，还有需求。这个事情说明，不能就钢材论钢材，就钢铁论钢铁，钢铁现在增长的需求是全社会增长的30%的需求，这对他来讲，肯定意味着很好的市场投资的前景。但是，如果你的投资到不了30%，降下来了，你的新型投资一下子就变成了过热的投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首先要采取一些经济政策，当然也包括金融政策。比如，过去几年我们为了弥补民间的投资不足，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民间的投资已经过高了，我们就应该把它降下来，另外还要想办法使民间投资的盘子缩小一点。这件事我们现在还没有做，明年肯定会做，我是希望做多一点。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考虑，首先不应该是针对哪个部门采取什么措施，而是从整个货币供给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使货币总量的扩张得到

抑制，然后再谈部门问题。

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果投向效率高的地区，比减少或者是淡出更重要

林毅夫：我同意樊纲的看法。我记得1993、1994年投资过快、过热，比如到首钢去买钢材的话，必须带着现金，交了现金以后排队才算数，才给你发。那时候对钢材的需求非常大，但是之后，局势变了，很多的钢材卖不出去了。这次钢材投资增长很快，目前是19000亿的钢铁生产能力，周期完了以后，可能会达到30000亿。今后如果不是持续30%的投资增长，就不能消化这么快的增长。但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可能钢铁生产能力的过剩会重新出现，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

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看到投资过热背后的动机是什么。1998年以来，投资增长过快、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的情形还没有走出去，为什么出现这一轮的投资过热？其实，本轮投资过热和过去的投资过热有一个共性，就是基本上是以信贷的积极扩张造成的。我们知道今年年初的货币政策目标，其中信贷增长目标是15.2%，但实际上达到了21%多，远远超过当初设定的目标。货币量增长这么快，并不是因为整个经济的需求突然增加，导致投资的增强，而是信贷的扩张导致投资的增强，这是相当大的危险。

另外，我们现在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怎么看待。我个人的看法是，也许还需要维持一段时间。原因是这轮扩张固然是投资拉动，而且很多是民间投资拉动，是民间银行的借贷，但估计银行通过信贷扩张支持投资的过速扩张是不可持续的，货币政策一定要调整，信贷的政策一定要调整，当这个调整以后，整个社会的投资需求就会下降，而且会有比较显著的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明年我们有可能整个的投资需求还是疲软的。在生产过剩与投资需求相对疲软的形势下，政府还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

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已经用了5年，一方面确有必要，另一方面则是怎么改进积极的财政政策效力的问题。前几年我一直在谈，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比较高的地方应该是在农村地区，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果往这方面投向的话，效果会比较好，比减少或者是淡出积极的财政政策更重要。

也产生了一种反竞争的、消灭竞争的趋势，但这里面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演变的过程。

赵 晓：前一段时间彩电行业发生亏损，政府有关部门把板子打在“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上，为此出台新的价格管制，规定以后谁降价，要先报告并讲明理由。

张维迎：在你说的这个例子中，就反映出国家身兼政府行政管理者与企业所有者双重身份之间的利益冲突，中国的管制好多都是这样形成的。

赵 晓：我们的政府其实有三重角色，一是作为一般社会管理者的角色，二是作为市场管理者的角色，三是作为企业所有者或者说是生产者的角色。这三重角色之间想不冲突也难。

张维迎：我想你这个总结很好。政府的三重角色，第一就是一般的行政系统，第二它作为一个特殊行业的管制者，同时它又是一个所有者。这三重身份结合在一起以后，权力使用的自由度就大大提高了。实际上，它很难承担好其中的任何一个角色。

管制造成大量成本

赵 晓：管制都有哪些成本？

张维迎：管制本身需要大量成本。管制机构的设立、人员经费，制定管制规则以及实施管制，无不需成本。

除了这些大家都能看到的摆在桌面上的成本，管制还有其他许多成本。首先，它会带来收入的再分配。有许多权力，像创业的权力，本来是普通老百姓的，但在以审批制的形式交给管制者以后，它会带来收入转移。

好比说，我原本可以自由地办这个企业，只要注册就行了；但现在必须先得到批准。我办这个企业一年可以赚100万元，得到你批准还是赚100万元。但是，为了得到你的批准，我必须贿赂你，所以我还得额外“投资”50万元。这就是一种收入再分配。

收入再分配会带来效率损失。如果创业的权力是我的，我100%

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重要一步呢？樊纲的看法是，民间状告政府是创新制度的制度创新，是WTO时代对内开放的重要环节，将直接带来民营企业运行环境的改善，意味着中国体制改革进入新的阶段。

樊纲：WTO的时代，是中国社会法律进一步健全、法治逐渐确立的时代。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除了一般性的舆论呼吁外，下一步可能会出现一个民营企业状告政府，通过法律途径争取合法权益、谋求一视同仁地位的过程。

民营企业发展到今天仍然面临着一些障碍，下一步民营企业的发展要靠政府和民营企业之间的互动来实现。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讲，权力不是谁给的，而是利益主体争取来的。现在对于发展民营企业，上上下下已取得共识，并开始有了一个大政策原则。但怎样落实到具体问题上呢？恐怕还需要靠民营企业自己来争取、来奋斗。

有这样—个案例。据网上消息称，上海有个民营企业要办银行，提出申请，银行管理部门不同意，结果被这个民营企业告上法庭：问为什么你让外国人来办银行，却不让我们办银行？并且提出：国家有政策，凡是对外国人开放的领域都要对民营企业开放，你为什么还不开放？当地法庭把这个案子驳回后，该企业后来又上告到高级人民法院。结果怎样目前还不太清楚，但这个民营企业的做法很有意思，也很有—些代表性。这几年，有过许多民间告政府的例子。比如，去年有律师就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的事状告铁道部，虽然案子没有受理，但今年春运的票价调整铁道部搞了价格听证会，不能说没有效果。还有上海人告证监会，说证监会的某个法令违反了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类似的例子，各地都有不少。

怎么来看这些事例？这些事例反映了中国法治体系的逐步形成，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现，是中国政府进步的表现，是整个中国法治体系进步的表现。民间可以告政府，民营企业可以依靠法律的框架来争取自己的权益、保护自己的权益，说明整个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实在是一件大好事。

从市场演化的角度看，状告政府实际上是在法律框架内通过政府和民间的互动来逐步完善市场的经济体制结构。状告政府，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矛盾比非法手段（剧烈的社会冲突、坑蒙拐骗等等）要好得多，比如民营银行通过正式渠道建立起来总比搞地下高利贷要好。状告政府，把问题摆在桌面上，便于各方面把利益说清楚，有利于公正对待。因此，这些事例确实表明：—方面中国体制改革已经进步到—定的阶段，另—方面中国体制改革的方式也将进入到下一个阶

犯其他任何个人的财产权。

再就是平等的制度安排。平等规则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人能够享有特权。否则，有特权的人就有可能去侵犯别人（没有特权的人）的财产权，财产权的保护也就谈不上。

有没有特权、能不能有效地保护产权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分界点。在这以前有好多制度，在这之后也有好多制度，但人类历史之所以区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关键的一点要看人与人是不是平等的，产权是不是得到保护的。

从理论上说，平等的含义中其实已经包括产权的平等，也就是财产权的不容侵犯。一个人财产权不受侵犯，从别人来说就是不能侵犯别人的财产。我们常说保护私有财产，换种说法就是不能侵犯私有财产。

谁能侵犯别人的财产？当然是有特权的人能够侵犯没有特权的人的财产。当任何时候有特权的人也不能侵犯别人的私有财产时，这个社会就平等了。这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不能通过掠夺、欺骗、强制手段获取他人劳动果实，而只能通过分工、合作和创新获得财富的文明社会。

财产权保护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在人类历史上至少经历了好几百万年才慢慢确立起来。这个变化使得人类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市场经济以前可以侵犯别人财产权的充满剥削和被剥削的阶段；一个是市场经济有了财产权，取消了特权，不再有剥削关系，人类社会新的文明发展的阶段。由此带来的深刻意义就是由于平等进一步带来许多新的关系，社会博弈的规则变得不一样了。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以前在人与人不平等的时候，每个人想出人头地，必须想方设法得到特权。但是特权显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这使得争夺特权的斗争非常激烈。大家争做皇帝，做了皇帝后还不安心，还害怕别人把他暗算了，就不得不整人，整掉这个不够，还要整掉那个，最后剩下孤家寡人。

这些你死我活的事，许多中国人曾经亲身经历过，大家亲眼目睹了人与人之间是多么地不平等、人与人的关系是如何地沦为争夺特权的撕咬关系。中国封建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基本上就是这样一幕戏：尔虞我诈、残酷无情、全无诚信。

过了这个阶段之后，才是文明的阶段：人跟人是平等博弈的关系。在这样的时代，它的主调是合作、创新（当然还会有各种争夺，但规则不同），这使得人类的财富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起来。我们目前经历的便是这样一段正在变革的历史。

中国的“农民·农业·农村”问题

当前，有关中国农民、农业与农村的话题，正成为政府与百姓共同关注的焦点话题。农民收入如何提高，税费改革前景如何，入世后中国农业将面临何样的挑战与机遇，中国城市（镇）化究竟应该如何进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景如何等等，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正撞击着山坳上的中国。

中国的核心问题依旧是农民问题，国民经济的首要问题依旧是农业问题。

“在全社会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的背后，实际上还隐藏着相当数量农民的收入绝对值在减少这样一个事实，这才是当前农民收入问题的严峻性之所在。”

“引起农民收入增幅下降和一部分农民收入绝对值减少的原因是复杂的。我个人认为，基本原因是农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跌，销售困难。”

“如不摆脱一个低速的、不景气的经济周期，尽快进入一个稳定的快速增长周期，农产品市场在短期内是很难完全好转的。”

“如果单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很简单，粮食少了价格就升，农民就会多种粮；粮食多了价格就跌，农民就会少种粮。这样的判断完全符合经济逻辑，但对于农民来说受不了。”

“任何队伍在执行政策时都可能会有质量问题，都可能出现钻空子的现象，但这种普遍的、大面积的钻空子、不执行政策的

要产业提供的收益在减少,从而有可能影响农民的投入、影响农业的后劲;另外由于农民的收入结构不一样,所以虽然全国平均的农民收入还在增长,但主要只是以非农产业为主业的农民收入还在增加,而主要依靠农业的农民收入的绝对值却在减少。因此,在全社会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的背后,实际上还隐藏着相当数量农民的收入绝对值在减少这样一个事实,这才是当前农民收入问题的严峻性之所在。

赵 晓:那么,农民收入增长乏力的原因是什么?

陈锡文:引起农民收入增幅下降和一部分农民收入绝对值减少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我个人认为,基本原因是农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跌,销售困难。这是由供求关系变化而引起的。所以改变或者调节供求关系非常重要。

政府从1998年实施的扩大内需的方针,采取了很多刺激消费者扩大消费的措施。但是从居民的最终消费来看,住宅、汽车、教育、旅游等新兴消费项目增长很快,而与农民收入直接相关的食品的销售并没有成比例地增长。这里有人们生理上的原因,也有消费习惯上的原因,总的看,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增加城镇居民的收入对于扩大农产品的需求并不明显。

因此,我们需要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做些分析。一方面,当前整个经济正处于相对缓慢的增长周期。在这个周期里,大多数生产者的经营状况都面临比较严峻的局面。虽然其中也有一些比较好的行业,比如IT业、金融证券、保险业,但大多数行业的经营形势都比较严峻,导致多数就业者的收入增长比较困难、支出更为谨慎。另一方面,大多数城镇居民的消费也正处在升级的阶段,生活费开支中的恩格尔系数快速降低,新增收入用于食品的开支明显减少。应该说,这两方面的情况对扩大农产品的市场都很不利。

大家都看到,价格下跌、销售困难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农产品,大多数工业品也都存在。进一步地看,这种现象也不仅存在于中国,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于全球。

这说明农产品市场不旺、农民收入增长面临的新困难,是与整个经济周期有直接联系的。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如不摆脱一个低迷的、不景气的经济周期,尽快进入一个稳定的快速增长周期,农产品市场在短期内是很难完全好转的。

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另一个深层原因,是农民就业太不充分。中国只有不到20亿亩的耕地,却有8亿多农业人口,靠这点土地是难

以使那么多人致富的。因此，在现阶段，除了农村自身的结构调整、提高质量、提高效率之外，更突出的问题就是必须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否则没有办法开辟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道路。当前为了促进农民增收，采取一些相关政策，比如税费改革等，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伴随一个大的政策——加快城镇化进程，那么农民的收入不仅在短期内，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难以快速增长。

一方面要看到当前农民收入增长的形势是很严峻的，8亿多农民收入上不去对国内市场影响很大。但另一方面，也要避免那种认为采取一两项目具体政策就可以解决农民增收的简单想法，要把农民增收问题放到整个国民经济、甚至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中去考虑。

赵 晓：很多人存在这样一个疑问，既然粮食产量是增长的，政府又实行了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为什么农民从农业中的收入不增反降呢？

陈锡文：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如果单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很简单，粮食少了价格就升，农民就会多种粮；粮食多了价格就跌，农民就会少种粮。这样的判断完全符合经济逻辑，但对于农民来说受不了。中国的古话是“粮贱伤农”，粮食多了会伤害农民。也就是说，虽然听任周期变化符合经济学逻辑，但对农民来说就那么点家底，他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因此在客观上、从具体的国情国力出发，用各种办法扶持农民、补贴农民，就成为各国政府的普遍做法。

我想中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所做所为正是为了避免“粮贱伤农”，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才采取了保护价的办法。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旦保护价高于市场价就会诱导农民多种粮，而粮食越多，市场价就越难回升。这是一个很大的悖论：如果不保护，市场的风险就都扔给了农民；但政府一保护，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市场信号，使农民盲目生产。这确实是很困难的抉择。

我个人觉得在粮食价格上保护农民是必要的。我们现在仍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为了比较平稳地过渡，在这个过程中采取一些过渡性举措确有必要。我们要从整个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和客观要求出发，而不能过于简单地认为某个具体政策是市场举措或是计划举措。

对于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它有点像在粮食期货中做“多头”。敞开收购就好比是做“多头”，即全部吃进。就国家的财力而言，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做期货的人都知道，就每一次具体的交易而言，很难说到底做“多”对还是做“空”

的水平，购进的粮食迟迟销不出去，企业没有经营收入，职工的工资、福利怎么办？三是我这个企业坚持按保护价敞开收，但如果有的企业不这么做，必然会出现谁按政策办谁吃亏。这样劣币驱逐良币，只要不执行政策的企业得不到及时惩治，就会有更多的企业不执行政策，最终造成整个政策被扭曲。

在这三点考虑中，企业受政府委托执行保护价如果发生亏损怎么办？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整个政策设计中缺的也是这个部分。这就导致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就有可能扭曲政策，不执行政策。

当初政策设计最理想化的地方就在这里：认为有了垄断这个前提，不论以保护价收进多少粮食最终都可以实现顺价销售，而只要做到了顺价销售，政府在保护农民上所付出的代价就不会太大。但在做这种设计时显然有两个关键因素没有考虑到：一是没有考虑到企业行为与执行政策的关系。以保护价购进的粮食达不到顺价要求怎么办？这个问题不明确，会导致粮食企业产生疑虑和行为扭曲，结果就会失去垄断粮食市场这个前提。二是没有考虑到在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的政策下，农民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农民看到政府公布的保护价还可以接受，而且又是敞开收购，他就不会去调减粮食生产。这两个因素相互作用，局面就会越来越复杂。因此我想，任何队伍在执行政策时都可能会有质量问题，都可能出现钻空子的现象，但这种普遍的、大面积的钻空子、不执行政策的现象，是与政策设计本身的缺陷有关系的。

赵 晓：这么说粮食保护政策对农民收入连续四年增幅的下降有一定影响？

陈锡文：精确的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模型计算。据我个人的经验判断，如果按保护价但不是敞开收购，粮食供过于求的局面可能不会持续这么长，也就是说市场粮价的回升点可能会出现得早一点。但就目前农产品供求的总体状况来看，农民要想从农业中获得更多的收入仍然是非常困难的。

试想一下，这些资源如果不种粮食而种其他的東西是不是能够使农民获得更好的收入？这其实并不确定。现在有些人认为，过去几年的粮食政策，使得粮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无效供给，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库存积压。这种认识隐含的前提就是粮食生产浪费了部分资源。那么，是不是“不浪费”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要看其他农产品是否存在短缺现象。现实情况是除粮食之外的其他农产品也没有短缺，而且绝大多数也是供过于求、价格下跌。所以我的基本判断是即使这

农 业 问 题

“总的看法，中国农业在入世后不至于那么令人担心，汽车厂的老板恐怕应该比农民的忧虑大一些。”

“平心而论，WTO框架就农业而言确实有利于新大陆国家而不利于传统国家。”

“要提高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涉及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一是要真正发挥国内农业的区域比较优势，让东南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多搞一些我们有优势的出口农产品，同时要切实抓好品种、质量和安全标准的管理体系建设，以符合国际市场的需求。”

“现在大家主要还在讨论过渡期内会怎样，其实真正的问题是过渡期后。如果大量的体制问题不能在过渡期内解决好，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五年之后就会真的很困难。”

“我们至少要做好两点：一是既然我加入了，就要调整、适应这种情况；二是要扬长避短，承认有亏有赚，争取少亏多赚。”

“我觉得类似欧洲和日本的道路我们走不了，代价太大，没有这么大的国力。”

“加入WTO最大的好处是迫使你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包括外贸体制的改革、国有粮食系统的改革，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我们的竞争力。”

“入世后中国的粮食安全程度会提高，但是到底进口比例多大，这不光是粮食的供求问题能决定的，更主要的决定因素是农民问题。”

“只有农产品有较大的出口，进口较多的粮食才不至于影响安全问题，同时在经济上也是划算的。”

